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A Personality Study



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

总统人格：

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

〔美〕亚历山大·乔治 朱丽叶·乔治 著 张清敏 译

乔治是“政治心理学领域的设计师、工程师和学术群体的建设者”，
“在国际关系的心理学研究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蓝图”。
——斯坦福大学 芭芭拉·帕尔默 (Barbara Palmer)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 / (美) 亚历山大·乔治、朱丽叶·乔治 (Alexander L. George and Juliette L. George) 著；张清敏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8

书名原文：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 a personality study

ISBN 978 - 7 - 5117 - 1829 - 7

I. ①总…

II. ①乔… ②张…

III. ①威尔逊, T. W. (1856 ~ 1924) - 个性心理特征

IV. ①K837.127 = 51 ②B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168 号

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杜永明

责任印制：尹 琨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总编室) (010) 52612339(编辑室)

(010) 52612316(发行部) (010) 52612315(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馆配部) (010)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377 千字

印 张：24.5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8.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多佛版序言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借对伍德罗·威尔逊研究的这项成果再版之机，谈一下我们对心理分析理论与传记工作的相关性问题的一些基本的考虑。^①

长期以来，在心理分析家所掌握的大量材料和传记作者所掌握的材料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一鸿沟被认为是无法逾越的。因此，一些人得出一个观点，传记作者不可能有效利用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师有机会从病人自己那里详细了解病人的潜意识感觉、愿望和幻想等，这些都是其行为的源泉。他询问的对象就坐在沙发上，以描述的方式向他提供必要的材料，如病人的经历、移情行为、梦和自由联想等。

与此相反，传记作者不能通过直接接触获得研究对象的内心想法。在那些研究对象还活着并愿意提供信息的极个别情况下，传记作者可能鼓足勇气提问那些个人的想法，这些问题往往是心理分析家日常询问其病人的问题，毫无疑问和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只能得到一些简短的空谈。传记作者总是受到有限和令人苦恼以及不完全的信息所支配，写仍然活着的人几乎总是如此，而对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也是如此。

不能否认这种观点的说服力。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传记作者能“心理分析”他的对象，因为他没有与传记对象有关的潜意识，而没有这些，经典意义上的心理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据此就认为心理分析对传记工作一无是处，则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他们忽视了“心理分析”

^① 此后的几页内容是我们正在做的对心理分析和传记关系研究的一部分。我们的工作得到基金会对精神病学研究的资助。

不仅仅是指针对个性错乱者的处方，它还意味着心理学的一套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建立在实证观察的基础上，解释人的个性的结构、功能和发展。其次，他们没有看到，心理分析和传记作者各自的目标有本质的不同，这个不同可以使传记作者在一些数据的基础上有效工作，而这些数据对心理分析来说是不够的。

心理分析旨在对一个病人有诊疗效果，旨在使病人在还没有得到解决的冲突条件下使其清醒，为的是向病人提供一个机会，让他获得比他原本已经采取的方法更加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传记作者却不需要去做试图改变研究对象个性的这个艰苦工作。他希望做的只是理解它，并把他的理解以笔头描述的方式传达给读者群体。在是否可以将心理分析理论用于对传记材料的分析的争论上，这两个事实都是至关重要的。

精神分析心理学对个体行为的理解，依靠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历史和发展，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精神分析心理学称这三者构成了人的心理。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学家已经通过数千病例研究了这些复杂的关系。在这些病例中，病人提供关于他们自己潜意识过程的数据，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分析的程序不仅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疗的方法。

容易观察到的特定类型行为，被认为是与某种原因性的因素和各种形式的冲突有关。对心理分析理论和经验的充分理解使传记作者（心理分析学者完成他的任务时也是如此）在他研究和关注自己所掌握的材料的时候非常敏感。过去几代心理分析专家在诊断和积累基础上公布的大量材料，可以作为传记作者手中很重要的线索，使他们了解特定人物的行为规律、习惯，或个性特质，否则他们会忽视这些性格特点。

传记作者的需求可以通过获得诊断假设而得到满足。诊疗学家的任务以诊断开始，因为他的工作是帮助他的病人实现一个更加满意的本能的能量分配，这种分配不需要病人投入太多的感情资本来保持自我克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努力去实现不可实现的孩提时代的幻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首先探寻病人的潜意识。如果诊断性的合作是成功的，病人就能意识到他受压抑的冲动，并更有成效和有意识地应对这种冲动。分析家努力了解病人潜意识幻觉是必需的。因为，为了摆脱这种难以企及、来自童年的快感，病人必须勇敢和理智地面对他的过去以及他强烈的冲动，这种快感是

互相缠绕在一起的束缚他的各种幻觉的核心。

对于心理分析者来说，大多数情况下他一直想了解是什么在折磨他的病人。他们高强度的工作主要不是提供分析者诊断所需要的材料——虽然随着材料的展现他的诊断肯定变得更加具体——而是为了让病人能成长和改变。

的确，心理分析家通常在治疗的一开始就能观察到病人个性的基本动态以及病人问题的基本性质，甚至在病人告诉他的梦境、自由联想、移情行为之前，这些就详细地展现了病人潜意识的内容。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掩盖他的动机，不管他如何试图这样做——所有的表面行为方式都是他基本的潜意识冲动结构的外在表现。在一篇心理分析技巧的文章中，弗洛伊德还说“对一个技术高明的心理分析家来说，通过病人的怨言和病情，清楚地理解病人内心的愿望并不难。”一些当代训练有素的分析家——如弗朗兹·亚历山大和里昂·索尔——认为，分析师能够也应该在第一次，或最多是最初几次访谈中，就能看出病人的核心冲突和性格的基本轮廓，这些通常存在于病人对他困难的叙述和他最初对他主要生活经验的阐述中。

那么对心理分析家来说，“读出”病人的潜意识并理解他的问题显然是其工作中最不困难的部分。真正的挑战是引导病人改变，这和分析工作中使病人必须意识到他潜意识的内容紧密相连的（有些心理分析家称，即使为了诊断的目标通常也没有必要重构病人的孩提时代的潜意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诊断技巧的重要一点，而非本讨论所关心的内容）。

除非是独一无二的不幸（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也是困难的），一个传记作者通常拥有相当多的材料，了解其主体对生活中问题的感受和反应，他甚至可以获得更详细的关于其主体在各种条件下行为的详细知识。的确，他可以得到心理分析家习惯上所没有的材料，如关于其研究主体对他人的实际影响，以及更准确的关于他的主体在现实中是如何与别人互动的，因为他的材料不仅包括其传记对象对特定事件前因后果的印象，而且还包括别人对这些的印象。简单地说，他手头经常拥有大量的关于一个人物的材料，这些材料从心理分析的假设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对解读传记对象来说也是无价的帮助。

为了证明将心理分析理论成功用于传记的可能性绝不意味着每个传记作家都能或应当力图如此。掌握心理分析理论需要多年的研究，以有用的方式将这种理论运用于传记资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任务，对传记作者来说，不论作为一个学者，还是作为一个人，都会有很多要求。

传记作者的原始材料一般都尘封在图书或档案中，有伟人寄出或收到的信件——孩提时代写给父母的潦草书信，年轻时代给他未来妻子，或者一个他可以吐露自己世界观以及对自己在世界上地位看法的朋友充满激情的书信，与生意场上熟人在日常工作中的往来函件；有报纸对其生活的报道，同时代人，包括朋友和敌人与这位伟人交往的记录等。如果这个政治人物生活在 20 世纪中期或更晚的时期，传记作者还能通过录音和电影亲自听到他的声音，或看见他，研究他的手势、他的面部表情，体验他在公共场合的“风格”的影响。也许传记的主体还写过书，或者透露他私下愿望和偏见的日记。还可能有官方的记录——这个伟人参加会议的记录和他所发表的讲话。也有与传记的主体具有各种关系的人——顾问、妻子、政治竞争对手、政治上的支持者、记者、朋友等的回忆录；每个人看到的都可能是这个伟人的一个不同的侧面。他这样出现在不同的环境下，使这些变得更复杂的是，每一种叙述都可能被这些作者赋予他们自己主观色调，受到撰写这些内容作者自己动机的影响。

所有这些材料都任由传记作者随意所用。他是所有这些凌乱的原始材料得以被消化的媒介，最后通过有序的语言再生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人，他的个性也揭示无异。只要传记作者正确观察并有逻辑地将分散的材料联系起来，表述出来，传记的主体就获得了新生，就可让任何愿意读的人阅读。只有那些根据其个性对有关传记主体的材料进行过滤，并且经过这些繁琐的加工，最后又没有扭曲这种个性的传记作者，才能胜任这个创造性的任务。

传记作者完成一个人物的传记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要令人满意地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历史传记作品中已经充分阐述过的那种富有献身精神的勤奋，他还必须有高尚的思想和精神境界，而这些却很少有彻底的阐述。当然，传记作者已经被反复告知，他们应该“不带偏见”，应当以提供“实情”为目标。但是，这个过程，也就是传记作者第一次看到这些

材料到作者最终把它们融合并叙述出来的过程，并没有在理论上加以阐述。这实际上是艺术创新的体现，而这种艺术创新的本质蔑视分析。简单地说，传记作者工作中最关键的方面，作者认知和消化这些材料的过程被忽略了。

传记作者希望理解他研究对象的生活。为了掌握他的研究对象在各种条件下如何做，传记作者希望从感情上了解他，能够亲身体验他的研究对象在其生活的关键时刻的感受。他希望能充分参与到他研究对象的感情经历中来理解他，但也不是过于陷入其中而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完全现实的环境下冷静地评估这种经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把他研究的对象真实地表现出来，传记作者和心理分析家一样，必须具有与研究对象既能融为一体，又能保持距离的能力。他必须与研究对象融为一体以理解他的反应，又必须保持距离以能判断和分析。

随着不断获得更多的材料，传记作者对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样一个人就逐步形成一个画面。比如他的个性、态度、自我防范意识是怎样的，又是怎么形成的，什么使他焦虑，什么使他感激，他人生的目标和价值观又是什么，是怎么去追求这种价值观和目标的，等等。

最初，传记作者对他研究对象的画面是模糊和粗线条的。但是，随着他对材料了解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多的细节被勾画出来，提供出更多可以用以进一步推断的观点。在他遇到一种情况，即他的研究对象的行为有点令人费解的时候，他可以先停下来，通过他自己已经形成的关于研究对象个性的画面，尝试把自己放在研究对象的位置来进行理解：如对一些特定环境和问题——或许是某种形式的政治挑战或挑衅——研究对象是如何感受的？对研究对象的生活时代的知识和外部的现实环境有充分理解的传记作家，好像是以研究对象内心反映的观点来“聆听”这些材料。如果他对传记主人公的意象非常好，且是通过高度敏感的方式获得的，而且他对手头问题的本质判断是准确的，传记作者就有可能实现对传记对象如何经历外部问题的理解。以前看来是深不可测的行为，而现在从产生这种行为的内在心理现实看就符合逻辑了。

传记作者通过移情可以掌握其研究对象在特定境况下的感受。如果让包括意识和潜意识在内的本能自由驰骋，他就能够理解传记主体可以观察

到的情绪与其整个生活历史的逻辑联系。他必须对他依本能做出的推理进行严格的、理性的审查，以评判其正确性。

如果他拥有充足的材料，移情和本能发挥得好，并且能对结论进行严格验证，传记作者就能解释他一直都在处理的历史证据。他的这种解释有助于他对传记主体的了解，这种解释，以及帮助他形成之种解释的观点，能够让传记作者形成和提炼出他对传记主体的心理意象，进而增强他应对解读下一个问题的能力，因为他在面对新的问题时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解更加丰富了。

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他对材料的更加熟悉和更透彻理解不断改进先前的假设。传记作者总是根据新的假设不断地重新审视和修正他对其研究对象先前的解读。随着他对这些材料的加工和再加工，他对研究对象的看法逐步实现了内在的统一。

前面阐述的传记作家的工作方式也适用于心理分析家在这的工作——心理分析家在这方面的作用在心理分析文献中已有充分的描述。^①但是，毫无疑问，许多历史学家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套学术用语。他们会说：传记作者当然需要移情和发挥本能的作用，问题是你怎么做？既然单单靠博学一项并不能解决问题，那么什么使一些人做得非常好，而另一些人却无能为力？完全可以说传记作者脑子里有一幅关于他的主人公个性的图画，如果这幅图画是细心得到的（sensitively derived），他就可以以自己的意识来理解主体的感受。难以捉摸的问题就在“如果这幅图画是细心得到的”这句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加强了，又是什么减损了传记作者在敏感性方面的能力？

在这一领域，心理分析可以对历史学家提供帮助，这些帮助对历史学家习惯的思维方式来说是新颖的。心理分析家揭示的破坏或帮助一个心理分析家“观察”其病人能力方面的东西——在心理分析理论中被称为反移情——在破坏或帮助传记学家真实和全面地“观察”他的主体方面也是有效的。

^① 这个方面一个非常好的阐述是拉尔夫·格林松博士的文章《移情及其变迁》。我们对此表示感谢。该文在1959年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上宣读，载《国际心理分析杂志》第41卷（1960年7—10月）。

弗洛伊德要求精神分析专家面对病人时应该始终保持高度的关注，传记作家为了理解其对象必须保持同样的关注度。如果精神分析家保持这种态度的能力受到损害，如精神分析家由于受到焦虑，或者由于自己生活经历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对病人产生一种敌视或内疚，他自己反移情行为就会阻碍他对病人的理解。同样，如果手中的材料受到他自己过去经历的干扰，传记作家对其主体的理解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一旦这些发生，他就可能产生那种人们熟悉的现象——传记作者揭示的内容比有关传记主体的内容还要多。

精神分析家和传记家都必须能毫无约束地分享他们研究对象的感受，这种能力不仅取决于他们与研究对象产生感情共鸣的范围和质量，也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理性能力。没有心理分析倾向，甚至反心理分析取向的传记家也必然使用他们的感情天赋。但是，认识不到这一事实或否定这一事实，就会让他们在进行全面的自我审查和消除知觉扭曲或解释时因为自身原因，而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关于人的发展的心理分析理论，被广泛认为是人们行为假设的丰富资源。受到分析概念的影响，在过去的几代人时期，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不仅希望描述而且希望解释人类单独或集体的行为的历史学家和传记学家吸收和利用这一新的知识群体就非常自然了。但是，必须承认，在弗洛伊德提出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原则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很少有精神分析取向的传记作品。为什么会是这样？

一个原因是，很少有一流的精神分析家有时间和兴趣做完整的传记研究（埃里克·埃里克松撰写的关于卢瑟的优秀传记则是少数突出的一个例外）；很少有一流的传记学家有时间、兴趣和能力掌握心理分析理论。精神分析家不能把精神分析理论当作一种捷径，减少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历史研究，减少对传记主体生活的社会背景的严肃认真关注。在心理分析理论方面没有足够基础的传记作者，也不能成功地恰如其分地利用零碎的材料来“解释”他们的主人公。无数庸俗不堪的传记作品，尤其是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那些传记，被严肃的学者看作传记艺术的笑柄，就证

明了这一事实。

精神分析理论和传记研究成功结合的另一障碍，是许多精神分析家和历史学家之间长期存在的相互怀疑。一个严肃的传记作家，只想获得心理分析理论方面的训练而不想成为一个诊疗家，在他试图将精神分析的概念用于分析历史资料时，会发现主要的精神分析研究机构的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非医学的“外行”很少被接受为学生而获得专门训练。对希望获得技术能力，以便在自己的学科认真负责地运用分析理论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种维护正式教育特权的门槛看来是毫无道理的。

同样，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对精神分析也抱有敌视和怀疑的态度。著名的外交史学家，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哈佛大学威廉·朗格教授，在该学会 1957 年的年会上发表的主席致辞中呼吁关注这一状况。朗格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下一个任务”。他指出这个任务就是让历史学家利用精神分析的概念和发现。他敦促他的同事放弃“对精神分析学说几乎全部否定的态度”，开拓思路，把心理分析理论当作推动历史学研究进步的最富有前景的关键因素。一点都不让人吃惊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历史学家愿意冒被同行蔑视，甚至危及其职业的风险，选择按照这种不被认同的方式进行一些跨学科的研究。

但是，在追求真理的压力下，这种交流的障碍正在减弱。有精神分析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已经开始有许多充满希望的合作努力。精神分析取向的传记作者的作品，很可能会展现出更多的评价，这种评价是以前他们从不敢想象的。他的任务仍然艰巨，但是对他研究对象的更深入的理解的前景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他在这个方向上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对他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的奖励。

亚历山大·L·乔治

朱莉·L·乔治

加利福尼亚

旧金山

1964 年 1 月

作者说明

有许多人对我们的工作提供过帮助。我们或者受益于他们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或者让我们查阅他们重要的手稿，或者让我们在文中使用他们的技术。

我们感谢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允许我们查阅国会图书馆中伍德罗·威尔逊的文件，允许我们引用威尔逊的一些文章；感谢查尔斯·西摩博士允许我们查阅和引用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爱德华·M. 豪斯的文件；感谢凯特林·E. 布兰德小姐允许我们查阅国会图书馆中的雷·斯坦纳德·贝克文件，并引用其中一些内容。此外，从1949年开始，国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许多优待，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我们也很高兴让亚力山大·乔治表达他对内森·莱茨博士的长期以来的感激。内森·莱茨博士1941年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的关于政治人物人格的课促使他开始研究伍德罗·威尔逊。还要感谢哈罗德·D. 拉斯维尔博士，他关于权利与个性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在本研究中试图使用的核心观点。

我们的手稿从编辑埃利斯·F. 肯德里克斯的慧眼和重视中受益良多，她还做了本书的索引。露西尔·M. 格德森和罗萨利·方诺洛夫以准确和良好的判断处理了我们的手稿。

最后，我们也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表达我们对约翰·德公司的玛丽·O. 隆巴德的感谢。她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对我们研究持续不断的兴趣一直是对我们努力的莫大鞭策。

亚历山大·L. 乔治

朱莉·L. 乔治

致 谢

作者希望感谢哈里斯·E. 科克夫人允许他们引用她已故丈夫雷·斯坦纳德·贝克所准备的关于威尔逊的一段话；感谢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允许我们引用洛奇参议员的《参议员与国联》（Charles Scriber's Sons, 1925），以及洛奇参议员的一些信；查尔斯·E. 梅里亚姆夫人允许引用查尔斯·E. 梅里亚姆的《四个美国政党领导人》（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6）；埃德蒙德·威尔逊允许引用《海边之光》（Farrar, Straus and Young, Inc., 1952）。

他们还想感谢以下出版社允许引用他们出版的著作：

Appleton-Century-Croft, Inc. : James Kerney,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of Woodrow Wilson*. Copyright, 1926, Century Company. Quoted by permission of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Beaverbook Newspapers, Ltd. : David Lloyd George, *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9).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 James E. Watson, *As I Knew Them* (Copyright © 1936), used by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Edith Bolling Wilson My Memoir (Copyright, 1938), used by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oodrow Wilso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8).

Doubleday & Company, Inc. : Ray Stannard Baker, *What Wilson Did at Paris* (1919),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8 Volumes) —all quoted by permission of Doubleday & Company, Inc.; Herbert C. F. Bell, *Woodrow*

Wilson and the People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Inc., 1945) ; Stephen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1944) , quoted by permission of Doubleday & Company, Inc. ; Carter Glass, *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 (Doubleday, Page and Company, Inc., 1927) ; Smith, *The Real Colonel House*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18) ; Joseph P. Tumulty, *Woodrow Wilson As I Know Him* (1921) , quoted by permission of Doubleday & Company, Inc. : Gerald Duckworth & Compnay, Ltd. , for the British rights to: George S. Viereck, *the Strongest Friendship in History* (Liveright, Inc. , 1932) .

Farrar, Straus & Cudahy, Inc. , William S. Hillman, *Mr. President*. Copyright 1952 by William S. Hillman and Alfred Wagg. Published by Farrar, Straus & Cudahy, Inc. , quo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Victor Gollancz, Ltd. , for British rights to: George A. R. Riddell, *Lord Riddell's Intimate Dia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nd After, 1918 - 1923* (1933)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Inc. : George A. R. Riddell, *Lord Riddell's Intimate Dia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nd After, 1918 - 1923* (Victor Gollancz, Ltd. , 1933) .

Harper & Brothers: Allen, Nevins, *Henry White: Thirty years of American Diplomacy* (1930) .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Robert Lansing, *the Peace Negotiations* (1921) ; William Lawrence, *Henry Cabot Lodge* (1925) ; Henry Cabot Lodge, *War Addresses, 1915 - 1917* (1917) ; Charles Seymour,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1930) ; William Allen White, *Woodrow Wilson* (1924) ; Woodrow Wilson, *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15th edition) .

B. W. Huebsch, Inc. : William B. Hale, *The Story of A Style* (1920)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Edward H. Buehrig, *Woodrow Wils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1955) .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George S. Viereck, *The Strongest Friendship in History* (1932) .

Macmillain Company: Thomas A. Bailey, *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 (1945) , and James T. Shotwell,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37) ,

both quo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Edward S. Corwin, *The President, Office and Powers, 1787 - 1948* (1948).

Overseas Press Club of America, Inc.: George S. Viereck, "Behind the House-Wilson Break," in *The Inside Story* (Prentice-Hall, Inc., 194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Edith G. Reid, *Woodrow Wilson* (193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rthur S. Link, *Woodrow Wilson: 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1947).

G. P. Putnam's Sons: D. F. Flem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18 - 1920* (1932); Mary Allen Hulbert, *The Story of Mrs. Peck* (Minton, Balch & Co., 1933); David Hunter Miller, *The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1928).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bert E. Osgood, *Ideals and Self-Interest i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Copyright 1953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目 录 Contents

多佛版序言	1
致 谢	10
前 言	1
第一章 威尔逊的童年时代	1
第二章 学徒政治家	12
第三章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33
第四章 新泽西州州长	52
第五章 见习顾问	75
第六章 “人逢其时”	92
第七章 成功的模式	116
第八章 威尔逊与国会	136
第九章 世界大战：中立与干预	162
第十章 暗 流	183
第十一章 世界的解放者	201
第十二章 巴黎和平会议	224
第十三章 “决裂”	245
第十四章 与国会之战	273
第十五章 失 败	295
研究说明	322
说明及参考书目	330
索 引	333
译后记	361

第一章 威尔逊的童年时代^{*}

孩子永远不能忘记其童年时代，也永远改变不了那些细微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其在孩提时代养成的，已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①

伍德罗·威尔逊

伍德罗·威尔逊 16 岁时，有一天他在书桌前练习书法，表妹杰西·伯恩斯走到他跟前。墙上挂着一幅表情严肃的画像，只要他抬起头来，一眼就能看到。杰西问这人是谁。“是格拉德斯通，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男孩充满敬畏地回答说，“我也想成为一个政治家。”^②

当然，这种表示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有无数的青年都表示他们想成为一个政治家、军事战斗英雄、无与伦比的医生、在原子时代外空的探索者。与众不同的是，这个充满梦想的年轻人成功地将他的大话般的幻想变成了现实。让他成功的个性特质是在儿童时代形成的，通常都是这样。他对自己永远不满足的倾向也是如此。尽管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他生活的最高目标——通过《国联宪章》——成败难料的时候，促使毁灭性的自我失败行为也是由他的性格造成的。我们必须通过威尔逊早年的生来找到他极其顽强的一面，以及导致他不折不扣的历史悲剧弱点的根源。

* 在为撰写威尔逊的正式传记做准备的时候，Ray Stannard Baker 搜集了大量关于威尔逊早期生活和上学阶段的材料。其中的大多数都在他八卷本研究的第一卷 *Youth 1856–1900* 中有精心和准确的描述。这些和 Baker Papers，尤其是 IB 系列中的材料是本章有关事实描述部分的主要材料来源。更多的关于威尔逊早期生活的材料被 William Allen White 的 *Woodrow Wilson: the Man, His Times, and His Task* 所收集。

① Baker, I, 49–50.

② Baker, I, 57.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1858 年 12 月 28 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他的母亲杰西·威尔逊出身于有文化、宗教气息浓厚的苏格兰家庭。与众不同的是，这个家庭几代人都是学者或长老会的牧师。他的父亲约瑟夫·拉格尔斯·威尔逊是具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长老会牧师。

威尔逊父母双方先辈中的几代人大多是牧师、长老、神学教授，或者是他们称职的妻子和孩子。那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都笃信宗教。宗教是他们生活的核心。他们信仰严格的加尔文教教义。根据这种教义，人天生是堕落、有缺陷的罪人，应当得到永远的惩罚。唯一获得拯救的机会在于被上帝选中而过上体面的生活，并以此获得永生。

毫不奇怪，真正信奉这种教义的人总是经常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否体面，于是常常焦虑，有时候甚至充满恐惧，总是通过自我审视来寻找他们是否有被上帝选中者的标志。严格的意义上说，如果找不到这种可信的标志，这种紧张感就会增加：上帝根据他不可莫测的意愿，已经注定每个人的命运，在凡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他关于人们命运的决定。多年来，这种严肃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理念，做善事，纯净的思想是被上帝选中的标志，而邪恶的行为则是厄运的标志。因此，信徒通过自我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进而推断自己是否被上帝选中，这是具有重要后果的事情。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做好事，抵制各种形式的诱惑——甚至是压制被诱惑的感觉。

接受这样的观念，即所有的人（甚至所有的儿童）都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抵制本属于人类本性的冲动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那些成功说服自己，他们的确是被上帝选中为体面子民的人，有时候会感到一种不受人类权威所控制的自由和兴奋。因为这样的人坚信任何事情都不能将他和上帝的爱分开，坚信从事自认为属于上帝引领的事业的工作就会得到神圣力量的指导和保佑。别人怎么想都是小事。如果需要，即使当面反抗世俗的权威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良心上一个人只需要对上帝和造物主负责。

这样的信条让人产生坚定的信念，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反对，他们都能坚持他们的原则。年轻的托米听到不少有关他的前辈的英勇故事。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还在他的叔父，一个哥伦比亚神学院教授，詹姆斯·威尔逊博士身上目睹了这种不屈的精神。威尔逊博士开始深信并教授达尔文的进